

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王立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目次

- 一 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
- 二 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
- 三 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遗存
- 四 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存
- 五 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

在我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中,嫩江中下游地区是东北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也是渔猎经济文化区的分布重心所在。1930年梁思永对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2],是中国学者最早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1932年发表调查报告,将清理的两座墓葬及采集遗物定性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批遗存长期被视为同一考古学文化,先后称为“龙江期”^[3]、“昂昂溪类型”^[4]和“昂昂溪文化”^[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该区域虽积累了大量调查资料,并有数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先后提出若干种遗存或文化的命名^[6],但除地处辽西山地与嫩江中下游文化区交汇地带的科左中旗哈民忙哈^[7]与

[1] 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2]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3]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3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

[4] 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5] 杨虎、谭英杰、张泰湘:《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

[6] 赵宾福:《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3年;金旭东、褚金刚、王立新:《吉林通榆县长坨子四处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郑钧夫、朱永刚、吉平:《试论哈民忙哈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0期。

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之外^{〔1〕},所获考古遗存并不丰富,尤其是缺乏比较关键的层位关系及成组的可复原陶器,以致于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序列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与之相应的是,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发展脉络及其与周邻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还十分薄弱。

2011—2015 年连续发掘的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是嫩江下游支流洮儿河南岸一个典型的沙垞型遗址。该遗址面积近 141 万平方米,遗存密集区范围 55 万平方米,包含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多个时期的遗存。迄今总计发掘面积 6450 平方米,共发现墓葬一百二十三座,灰坑六百四十七个,灰沟五十一条,房址四十三座,获得了大量人工遗物及动植物遗存。据初步整理,遗存分属七个时期^{〔2〕}。其中第一至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为居住和活动的遗迹,多个灰坑或灰沟中有明显的祭祀现象。

本文拟通过后套木嘎遗址四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嫩江中下游及周边区域相关遗存的比较分析,明确各期遗存的文化特征,辨析各类遗存的性质、来源、年代及与周邻文化的关系,并尝试构建嫩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编年序列,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 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

该期遗存包括 AⅢ 发掘区的第 3 层及其下开口单位(如 AⅢ G22),以及开口于第 2 层下、打破第 3 层或生土的 AⅢ G18、AⅢ M45、AⅢ H189 等单位。遗迹种类有灰沟、灰坑与墓葬。陶器中夹炭陶占绝大多数,器表多为灰褐或黄褐色,而胎芯为黑色。可辨器形有筒形罐、大口曲腹罐和钵等,底多近平或内凹。陶胎甚厚,厚度多在 0.8—1.5 厘米之间。从陶片断碴和表皮脱落处观察,这类夹炭陶系以粗细均匀的植物纤维与泥浆混合制成泥圈,再逐圈套叠成形,继而于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 年第 7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 C 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1 年第 11 期。

〔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 AⅢ 区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9 期;《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 AⅣ 区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11 期。需要说明的是,2011 年后套木嘎遗址 AⅢ 区的发掘绝大多数探方未能清理到底,该年度发掘报道将出土遗存分为四期,其中第一、二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王立新、霍东峰、石晓轩、史宝琳:《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 年 8 月 17 日文物考古周刊发现版)。2012 年发掘结束后,我们曾根据初步的整理将 2011 与 2012 两个年度发掘所获遗存划分为六个时期,其中第一至三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见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 年。但当 2013 年春季对出土资料做进一步整理时发现,原划归后套木嘎第二期的遗存中,有部分开口于 AⅢ 区第 2 层下的灰坑、灰沟的出土遗物比较特殊,多系器表装饰细附加堆纹条带的筒形罐残片,而明显有别于原第二期多数单位中出土陶器的特征,因而将这部分单位作为新识别出的第二期遗存,原第二期的多数单位归入新划分的第三期,而原第三至第六期则依次编为第四至第七期。

器表内外涂挂细泥浆，泥圈套叠处器表明显起棱。经检测，陶器是以高铁易熔黏土烧制而成，而且烧成温度不会高于 700 度^{〔1〕}。陶质极酥软，尤其是内外表皮容易龟裂脱落。陶片出土时如不经适当风干即行起取，往往会变为碎渣。

在此类遗存层位偏晚的 AⅢG18 中，有少数夹炭陶的胎内屛有蚌粉，个别陶片中除含炭化植物纤维外还屛有石英砂粒，这些陶片的硬度超过了普通的夹炭陶。表明在该类遗存的较晚阶段，人们已在尝试改变陶器内的搀和料，从而使陶器获得更为优良的耐火性能和强度。除个别陶器为素面外，绝大多数陶器的器表通体施纹。多见以较厚的片状刻齿工具戳压而成的栉齿纹，纹样有横向排列成带的人字纹、短条平行线纹、短条弧线纹等，器表往往留有较深的印窝。也有少量以薄片状带齿工具压印而成的平行斜线纹、平行弧线纹和之字纹，但印痕较浅。还有少量的栉齿弦纹、栉齿竖线纹和栉齿波曲纹条带，细密的齿痕连绵不断，很像是用齿轮状工具滚压而成的。反向珍珠纹（陶胎未干时由外向内戳压的成排圆形坑窝，器壁内侧相应位置起包）仅见数例（图一，9—17）。

与堆积中常见破碎陶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期的地层及已发掘的数十个遗迹单位中石制品极为少见，且仅见刮削器、镞、两面压剥刃部的长条形复合工具及细石叶等。灰坑、灰沟内见有大量鱼骨、蚌壳及少量陆生哺乳类动物骨骼。

AⅢG18 出土夹炭陶片（ZK—3800）和 AⅢH248 出土狗髀骨（ZK—4464）经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检测，年代分别为距今 12940—12850 年和 11760—11270 年。AⅢM45 出土人骨（ZK—4462）由北京大学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测定，年代为距今 11235—11145 年。我们还选取了第一期 AⅢH143（MTC—17581）、AⅢT1006③（MTC—17582）、AⅢH233（MTC—17583）、AⅢH189（MTC—17585）、AⅢG22（MTC—17584、MTC—17586、MTC—17587）出土的七例包含有机质的样品送至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技术室做年代检测。其中 MTC—17581、MTC—17582 陶片胎土所含有有机质的碳十四年代分别为距今 12665—12395 年和 12557—12132 年；而 MTC—17583、MTC—17584、MTC—17585、MTC—17586 和 MTC—17587 炭化附着物的年代分别为距今 11929—11330 年、13031—12445 年、11602—11206 年、12384—11833 年、12530—12102 年（以上数据均经树轮校正，半衰期为 5568 年，置信度为 95.4%）。

从以往俄罗斯学者关于远东和西伯利亚早期陶器的年代学研究来看，陶器胎土所含有有机质的碳十四检测数据与木炭的碳十四检测数据是比较接近的^{〔2〕}。而日本学者近年开展的一系列陶器器表炭化附着物的碳十四年代检测结果表明，这些残留物的年代往往比相关的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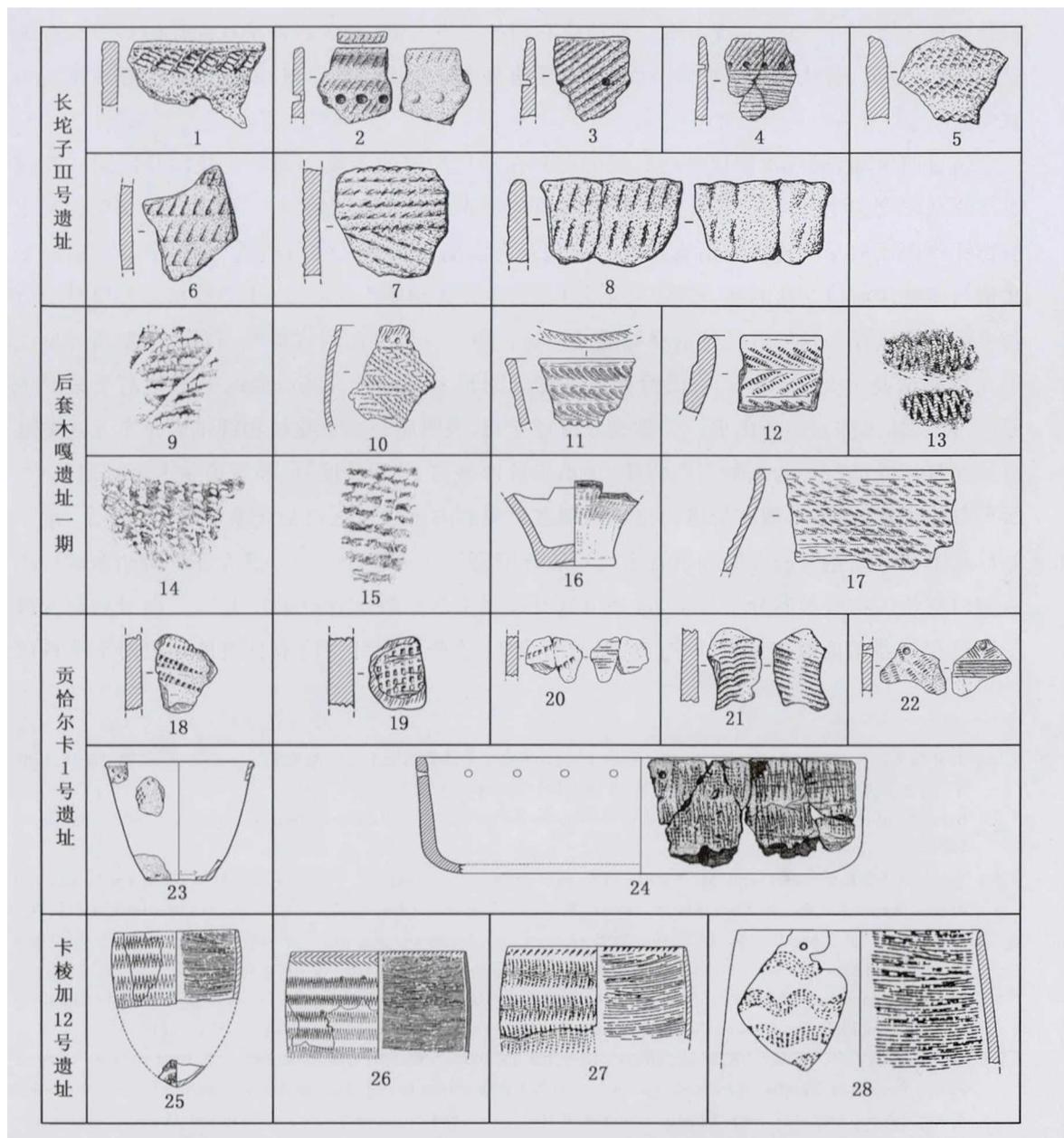
〔1〕 刘爽、崔剑峰、王立新：《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陶片科技检测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 21 辑，科学出版社，2017 年。以下关于后套木嘎遗址陶器烧成温度的检测结果均出于此文。

〔2〕 Yaroslav V. Kuzmin. , The earliest centres of pottery origi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review of chronology for the oldest Neolithic cultures.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23(2003): 37—46.

炭样品的检测年代偏老数百年不等,甚至可以偏老 1000—1500 年^[1]。经综合考虑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的碳十四检测数据,我们认为该期遗存较为可靠的年代应在距今 12900—11100 年。此外,第一期的地层及遗迹单位的堆积均为颜色偏淡的灰黄色,与其下叠压的淡黄色纯净细沙土即与生土的颜色较为接近,且普遍叠压在第 2 层黑灰色沙质亚黏土之下,表明这些堆积的形成应在全新世大暖期之前。AⅢ M45 出土人骨亦有一定程度的石化。这些显然也可作为第一期遗存年代在距今万年以上的旁证。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东亚与北亚地区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产生陶器的地区,而且陶器的产生是该地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2]。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年代在距今一万年以前的陶器在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外贝加尔及中国的华南、华北地区陆续有所发现。而中国东北作为东北亚的腹心地区,却长期缺乏一万年前的陶器的发现。梶原洋教授曾推断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当在一万年以上,属于奥西波夫卡文化的地方变体^[3],但该遗址现有材料不足以明确其陶器组合特征,也缺乏必要的年代数据。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发现,正填补了早期陶器在地域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从宏观的比较来看,该期遗存既具有早期陶器的一般特征,如陶胎厚、陶质疏松、烧成火候低等。也显示出一定的区域特点,如从底部形态看,后套木嘎一期陶器所见基本是近平底或凹圜底,特征与黑龙江下游的奥西波夫卡文化以及华北的徐水南庄头^[4]、阳原于家沟^[5]、北京转年^[6]、东胡林^[7]等遗址所

- [1] Dai Kunikita, Igor Ya Shevkomud, Kunio Yoshida, Hiroyuki Matsuzaki, Radiocarbon dating of charred remains on pottery and analyzing food habits of the Osipovka culture, Russian Far East; Masahiro Fukuda, New 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the Yamikhta site. In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prehistoric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Northern Circum Japan Sea area (I): Yamikhta site excavation report*, directed by Shizuo Onuki. Tokoro Research Laboratory,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4: 108—113, 157—160.
- [2] Chard C. E., *Nor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Wisconsin, 1974: 63—64; Barnes G. L.,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Korea and Japan*.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93: 69.
- [3] 梶原洋:《シベリア? 极东の更新世—完新世移行期と土器の起源》,《シンボツウム:更新世—完新世移行期の比较考古学》,23—31 页,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史学科考古学研究室、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春成秀尔研究室,1998 年。
- [4]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大学历史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 11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997 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 年第 3 期。
- [5] 梅惠杰、谢飞:《华北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泥河湾盆地阳原于家沟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册,文物出版社,2002 年。
- [6] 郁金城、李超荣、杨学林、李建华:《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 年第 3 期;郁金城:《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年。
- [7] 东胡林考古队:《北京新石器早期考古的重要突破——东胡林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文物报》2003 年 1 月 7 日第 1 版;赵朝洪、郁金城、王涛:《北京东胡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 年 5 月 9 日;赵朝洪、王涛、员雪梅、崔天兴、郁金城、郭江宁:《北京东胡林遗址发掘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 年第 7 期。



图一 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与相关遗存陶器

1. ■采：4 2. ■采：2 3. ■采：3 4. ■采：1 5. ■采：15 6. ■采：16 7. ■采：7 8. ■采：5 9. A■G18
 ①：26 10. A■H125：1 11. A■G18②：5 12. A■G18①：21 13. A■H146：2 14. A■T1006③：6 15. A■
 T1006③：5 16. A■G18①：19 17. A■H189：10 18. E/4区出土 19. U/10区出土 20. V/6区出土 21. U/1
 区出土 22. O/12区出土 23. Z/16区出土 24. D'4-5.3p1区出土 25-28. 卡棱加12号遗址出土

见早期陶器相近，而与外贝加尔、日本列岛及中国华南的早期尖底或圜底陶器则有显著的区别。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这一广阔区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正是以往大家所熟悉的平底筒形

罐的分布区域^{〔1〕}。包括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在内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平底陶器的传统有着更早的起源。但是,若从陶质和纹饰方面看,该期遗存则显示出与其以东、以北地区遗存的更大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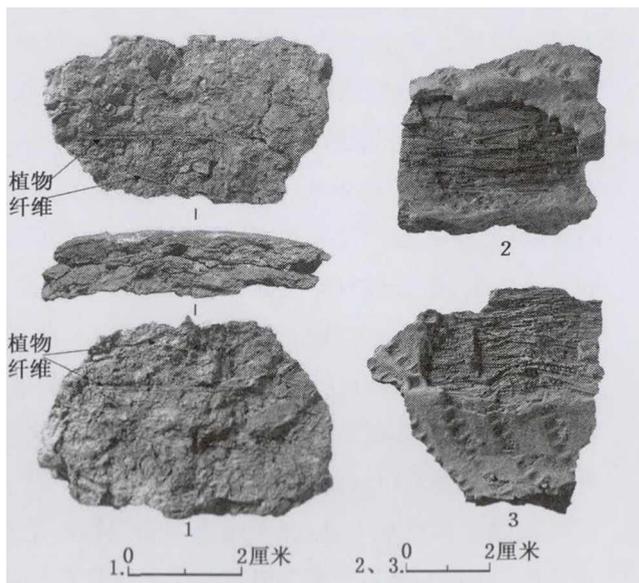
就目前所知,胎内含炭化植物纤维的陶器在外贝加尔的卡棱加河口文化以及黑龙江流域的格罗马图哈文化、奥西波夫卡文化已发现的重要地点中都能见到^{〔2〕}。以上三个文化含炭化植物纤维陶器的早期阶段与后套木嘎一期遗存陶器的年代有长时段的重合,其中奥西波夫卡文化与卡棱加河口文化的碳十四年代上限(经树轮校正约距今 16000—14000 年)^{〔3〕}要早于后套木嘎一期遗存。这种含炭化植物纤维的陶器在距今一万年前后或更晚一些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克拉斯纳亚·戈尔卡^{〔4〕}、哈巴罗夫斯克专区的雅米赫塔^{〔5〕}、滨海地区的切尔尼戈夫卡 1 号^{〔6〕}以及韩国济州岛高山里^{〔7〕}等遗址也可见到,表明胎内含炭化植物纤维应是东北亚地区曾长期且广泛流行过的一种制陶传统。但由卡棱加河口 12 号遗址^{〔8〕}和贡恰尔卡 1 号遗址^{〔9〕}所公布的陶器照片看,俄罗斯境内出土早期夹炭陶胎内所含炭化植物纤维多数少而凌乱,远不如后套木嘎一期遗存陶器胎内所含炭化植物纤维密集和整齐(图二)。黑龙江下游胡米遗址陶器胎内炭化植物纤维的分析显示,这些植物纤维属于莎草科(Cyperaceae)^{〔10〕}。而对后套木嘎一期遗存陶器胎内炭化植物纤维的比对分析表明,这些植物纤维应取自遗址旁边的禾本科植

- 〔1〕 大贯静夫:《东北亚洲中的中国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38—64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 年第 4 期。
- 〔2〕 Irina Zhushchikhovskaya, On early pottery—making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1997): 159—174.
- 〔3〕 Yaroslav V. Kuzmin, Viktor M. Vetrov,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omplex in Siberia: the Ust—Karenga 12 sit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Neolithisation process in Eurasia.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2007): 9—20; Шевкомуд Н. Я., Гродекова Н. П., Кузьмин Я. В., Хронология каменного века нижнего приуралья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и другие проблемы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древностей востока Азии, Хабаровск, 2009, С. 7—46.
- 〔4〕 Natalia Tsydenova, Henny Piezonka.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Initial Neolithic in the Baikal region: Tech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tone industrie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355(2015): 101—113.
- 〔5〕 Yanshina, O. V., Early Neolithic potteries from the Yamikhta site.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prehistoric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Northern Circum Japan Sea area (I) ; Yamikhta site excavation report*, directed by Shizuo Onuki. Tokoro Research Laboratory,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4: 141—152.
- 〔6〕 Irina Zhushchikhovskaya, On early pottery—making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1997): 159—174.
- 〔7〕 康昌和、吴莲淑:《济州高山里遗址》,16—43 页,济州大学校博物馆,2003 年;康昌和:《济州高山里新石器文化研究》,岭南大学校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
- 〔8〕 Yaroslav V. Kuzmin, Viktor M. Vetrov,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omplex in Siberia: the Ust—Karenga 12 sit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Neolithisation process in Eurasia.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2007: 9—20.
- 〔9〕 Шевкомуд Н. Я., Яншина О. В., Начало неолита в Приамурье: поселение Гончарка—1.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48—173.
- 〔10〕 Irina Zhushchikhovskaya, On early pottery—making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1997): 159—174.

物。年代上限较后套木嘎一期偏早的加夏、胡米等遗址陶器胎内除含炭化植物纤维外，均含有大小不一的砂粒，且岩性不一〔1〕，不像是人工有意识掺入的，显示了更明显的原始性。而后套木嘎一期陶器以禾本科植物的纤维和泥逐圈套接成形，再于器表内外涂挂细泥浆，虽然所制陶器器壁较厚，但陶质却是人为选择和控制的结果。且稍晚阶段又出现了掺入蚌粉或石英砂的尝试，说明后套木嘎一期陶器从陶质的人为控制角度是较加夏、胡米遗址的陶器相对先进。与后套木嘎一期陶器类似的栉齿短平行线纹、栉齿之字纹见于奥西波夫卡文化的贡恰尔卡 1 号遗址（图一，18—24）与卡棱加河口文化的卡棱加 12 号遗址（图一，25—28）的陶器装饰，而且是

后一文化中最流行的纹饰种类。鉴于这两个文化的年代上限都早于后套木嘎一期遗存，所以不排除后套木嘎一期的这两类纹饰是受它们影响而产生的可能。而以栉齿类工具戳压或以带齿的轮状工具滚印出来的纹饰，遂成为外贝加尔地区与黑龙江流域（洮儿河属于黑龙江的三级支流）早期陶器曾共同流行过的装饰风格。同时，也不能否认后套木嘎一期遗存陶器纹饰与外贝加尔和黑龙江下游地区早期陶器的区别。在奥西波夫卡文化中，除贡恰尔卡 1 号遗址部分陶器装饰栉齿纹之外，其他遗址所见陶器器表多见刮抹痕或编织物印痕〔2〕，未见此类装饰。卡棱加河口文化陶器最流行的栉齿之字纹在后套木嘎一期陶器中仅见少量，加之前者的陶器多系尖圜底，胎壁较薄，所以后套木嘎一期遗存与奥西波夫卡文化及卡棱加河口文化陶器的区别仍然十分明显。

再看邻近地区。我们于 2007 年在通榆县长坨子Ⅲ号遗址采集的陶器，即简报所称的长坨子 A 类遗存〔3〕，与后套木嘎一期遗存有相似之处，陶胎中几乎全含有炭化植物纤维的痕迹，器



图二 贡恰尔卡 1 号遗址与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陶片胎内所含炭化植物纤维

1. 贡恰尔卡 1 号 D' / 5 区出土 2、3. 后套木嘎 A ■ G18①出土

〔1〕 Irina Zhushchikhovskaya, On early pottery—making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1997): 159—174.

〔2〕 Irina Zhushchikhovskaya, On early pottery—making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1997): 159—174.

〔3〕 金旭东、褚金刚、王立新：《吉林通榆县长坨子四处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2011 年第 3 期；赵海龙、王立新、夏宏宇、王春权：《东北渔猎型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个案——吉林通榆县长坨子Ⅲ号地点细石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集（2009）》，文物出版社，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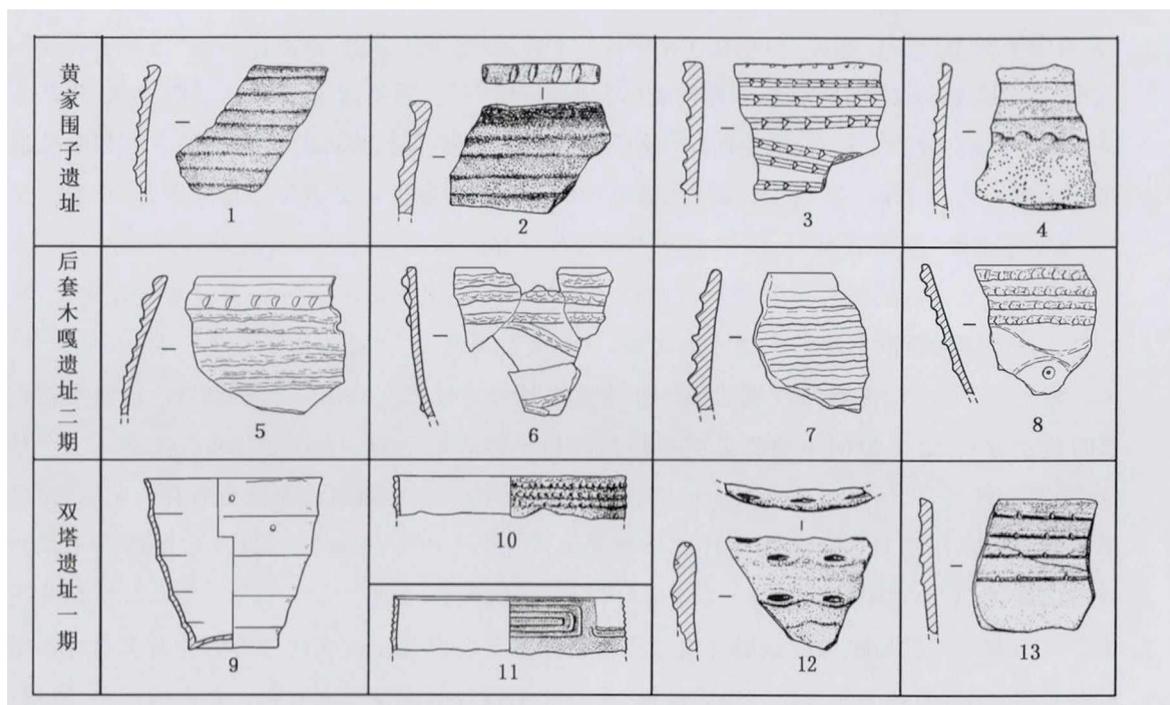
表以黄褐色居多,胎芯为灰黑色,陶系特点与后套木嘎一期陶器接近。纹饰以片状带齿工具压印的短条平行线纹、弦纹、平行斜线纹也见于后者。但前者陶胎内含炭化植物纤维量甚少,夹蚌粉更为普遍,还有少量臃粗细不均的石英砂粒,陶质和硬度明显优于后者。前者的器壁厚度多在 0.5—0.9 厘米之间,普遍较后者变薄,且器壁厚薄比较均匀。前者纹饰种类新增戳压平行列点纹(坑点形状有三角形和指甲形),反向珍珠纹数量增多,而不见栉齿人字纹、栉齿短弧线纹和栉齿之字纹。纹饰的排列也较后者更为规范(图一,1—8)。所以就制陶技术的演进可以推测,长坨子 A 类遗存的年代应晚于后套木嘎第一期遗存,而且很可能是继承后者发展而来的。鉴于长坨子 A 类遗存目前尚缺乏发掘品,陶器群整体面貌不大清楚,它与后套木嘎一期遗存究竟是不同的文化,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暂将二者作为有承继关系的两类遗存看待。

从以上比较来看,后套木嘎第一期遗存应是我国东北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填补了超一万年早期陶器在地域分布上的空白,它与周边广阔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其陶质、器类和纹饰组合也有别于现已命名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应代表着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之为“后套木嘎一期文化”。经检视镇赉第三次文物普查采集标本,得悉与后套木嘎一期风格类似的夹炭栉齿纹陶器还见于黑鱼泡乡报马吐村疙瘩山、沿江镇西二龙西北山、苇海村乌里布等少数几个遗址^{〔1〕}。其中黑鱼泡乡胡不台遗址所采集的一片夹炭陶,陶质、陶色与火候均十分接近后套木嘎一期陶器特点,但器表却装饰竖向绳纹,纹痕较为模糊。黑鱼泡乡珠山西沙岗遗址采集的一片饰短条栉齿纹的陶片,胎内含植物纤维少而乱,风格类似于长坨子 A 类遗存陶器。由此可见,尽管上述两类遗存以往虽因少见而不为人知,但在嫩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其一定的分布范围。

二 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

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仅见于 A 区第三象限发掘区,以开口于第 2 层下的 AⅢ H97、AⅢ H131、AⅢ H141、AⅢ H246、AⅢ G2、AⅢ G13、AⅢ M56 等单位为代表。遗迹种类包括墓葬、灰坑、灰沟等。出土陶器均系残片,以夹蚌的灰褐陶为主,质地较第一期陶器略硬。经检测,此期陶器胎内所属蚌粉不仅粒度较为一致,种类基本单一,而且蚌片的排列也基本平行于器物的内外表面,显然是经过了练泥等人为处理的结果。掺入蚌粉的含量甚至超过了 SiO₂ 的含量,烧成温度低于 731 度。可辨器形有直口或敞口的筒形罐、敛口弧腹罐、侈口鼓腹罐等。唇部多有加厚现象。器表多见贴敷的平行窄条附加堆纹,堆纹条带既有间距疏阔者,又有排列紧密者。排列紧密者多经手指捏压,致使堆纹条带的外缘形成尖锐的棱(图三,7)。排列较疏阔者则多以手

〔1〕 资料现存镇赉县博物馆。



图三 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与相关遗存陶器

1. H1 标: 1 2. T7③标: 1 3. T2②标: 3 4. T2②标: 6 5. A ■ H97: 3 6. A ■ H131: 9 7. A ■ H131: 10
8. A ■ H246: 1 9. ■ T406②: 4 10. ■ T303②: 11 11. ■ T117②: 11 12. ■ T117②: 16 13. ■ T126②B: 2

指或工具在其上戳压连续的坑窝(图三,5、6、8)。也有以附加堆纹条带组成的简单几何形纹饰(图三,6、8)。纹饰占器表面积在三分之一以上。从较大的陶片上可看出,陶器是以泥圈套接法成形。

此期遗存的灰坑、灰沟中仍常见鱼骨、蚌壳,也有较多哺乳动物的骨骼。石器与第一期相似,以细石器制品为主,不见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

此类遗存的陶器特征与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图四,9—12)^[1]、额拉苏C地点(图四,13—15)^[2]等遗址早期采集或清理所获的附加堆纹陶片及吉林镇赉黄家围子遗址早期遗存^[3]陶器(图三,1—4)基本一致。该类遗存以往多被笼统地归入昂昂溪文化。刘景文认为,此类遗存特征虽“与黑龙江昂昂溪遗址的早期遗存基本相同”,但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而称为

[1]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58—90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 奥田直荣:《北满昂昂溪细石器堆积层的发掘》,《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1辑,范小秦译,刘晓东校,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年;大贯静夫:《昂々溪采集の遗物について——额拉苏C(オロス)遗址出土遗物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第六号),1987年。

[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简报发表的黄家围子早期遗存的面貌并不单纯,例如T3①标:1陶片戳压弧形列点纹,属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的一类典型纹饰,而不见于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应剔除。

“黄家围子类型”〔1〕。实际上,早在 1974 年赵善桐、杨虎即已指出,所谓昂昂溪“细石器文化”,“应限定于以五福(C)的两座墓葬为代表的早期遗存”〔2〕。近年赵宾福亦持类似主张,并认为昂昂溪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是嫩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3〕。这是有道理的。我们曾指出,梁思永早年在昂昂溪遗址调查所得材料中,至少包含了“黄家围子早期”与五福 M1、M2 两类新石器时代遗存〔4〕,二者的遗存特征有本质区别。因此,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应当是年代和性质与昂昂溪文化明显有别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我们建议以较早发掘的黄家围子遗址为代表,将此类遗存命名为“黄家围子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1992 年发掘的黑龙江肇源小拉哈遗址曾区分出一期甲组与乙组两类新石器时代遗存〔5〕。其中的一期乙组遗存包括开口于第 3 层下的 H3062、G3001、G3002 三个单位,陶器皆残片,以饰多条平行附加堆纹条带的罐类器为主。发掘者认为该类遗存应归属“昂昂溪文化”范畴,并据 H3062 所出陶片的热释光年代为距今 4000 ± 360 年,以及 G3002 所出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3688 ± 104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 2130—前 1777 年),推断此类遗存应为本地年代最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据笔者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标本室观察实物,此类遗存的陶器胎内也含蚌粉,而并非如报告所说仅是夹砂陶。陶器的陶色、器形、纹饰特点也与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及黄家围子早期遗存的陶器如出一辙,应归属于黄家围子文化。鉴于小拉哈遗址第 3 层下绝大多数单位属于报告所分第二期,且第二期单位 H0001 所出陶片的热释光测年为距今 3830 ± 340 年,与上述两例测年数据比较接近,我们有理由推测 H3062 与 G3002 本身亦属该遗址第二期单位,其中所含夹蚌粉的附加堆纹陶片应为脱离原生单位的早期陶片。

可以看出,黄家围子文化与新近命名的双塔一期文化〔6〕,其陶器在陶质、陶色、器形、纹饰、制法方面均有明显的相似性。绝大多数胎内都夹有含量不等的蚌粉,都有一定数量的灰褐陶和黄褐陶,可辨器形有筒形罐、敛口弧腹罐和侈口鼓腹罐,都以附加堆纹为主要纹饰,制法均为泥圈套接法。但二者的区别也十分显著,双塔一期文化的陶器以黄褐陶为主(依据双塔 II T107 与 II T108 第 2 层出土陶片的统计,黄褐陶约占 49%,灰褐陶和灰陶分别占 27% 和 20%),陶质较为疏松,器表凹凸不平,器身颇不规整,制作痕迹明显;器形以直口或敞口的筒形

〔1〕 刘景文:《论腰井子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兼谈吉林省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博物馆研究》1990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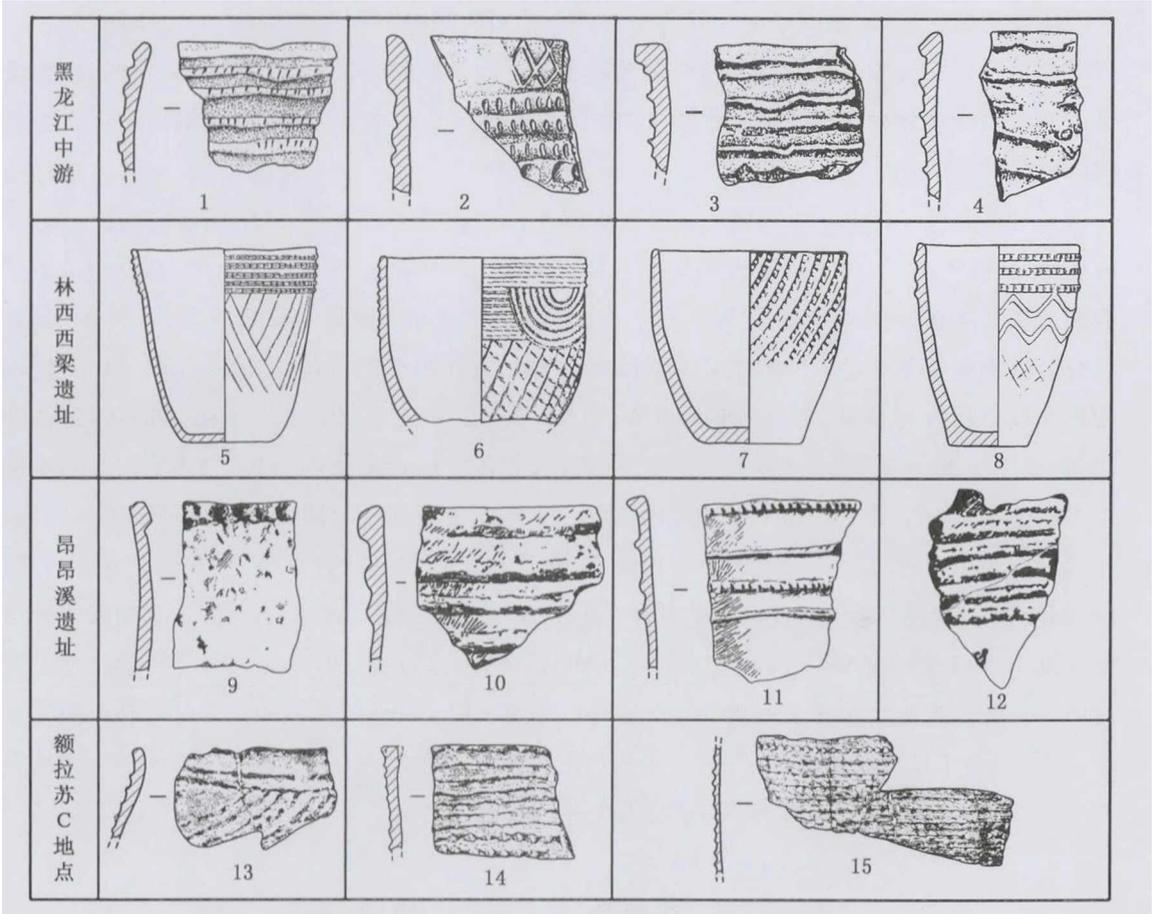
〔2〕 黑龙江省博物馆:《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4 年第 2 期。

〔3〕 赵宾福:《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 2 辑,科学出版社,2003 年。

〔4〕 段天璇、王立新、汤卓伟:《吉林白城市双塔遗址一、二期遗存的相关问题》,《考古》2013 年第 12 期。

〔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 年第 1 期。

〔6〕 王立新、段天璇:《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 年第 4 期。



图四 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遗存与相关遗存陶器

5. F1②: 33 6. F1②: 34 7. F6②: 3 8. F7②: 2 (1-4.9-15. 遗物编号不详)

罐为主；绝大多数为素面，纹饰陶比例很低，附加堆纹多为装饰在近口部的一至五道平行的条带；附加堆纹条棱既有圆钝者又有尖锐者，但以圆钝者较多(图三，9—13)。而从黄家围子文化已发掘各地点的陶器来看，陶器以灰褐色为主，质地较双塔一期文化陶器略硬，且器壁厚薄较为均匀，器身套接痕迹已不明显；从可辨器形的陶片看，敛口弧腹罐、侈口鼓腹罐与直口或敞口的筒形罐数量大致相若；器表多见平行的附加堆纹条带，以捏压形成的尖锐条棱者居多，且纹饰在器表所占的面积远大于双塔一期的施纹陶器；另在器物唇面、唇部外缘和附加堆纹条带之上习见戳印坑点，坑点形状多种多样。这些区别的存在，也是我们将二者视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主要依据。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这两类遗存之间的层位早晚证据，但从陶器制作技术的演进来看，黄家围子文化的制陶技术明显要比双塔一期文化进步，年代可能晚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双塔一期文化。同时，二者陶器面貌与特征相似性的存在，也可说明黄家围子文化很可能是继承双塔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

还需指出的是,黄家围子文化陶器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林西西梁遗址^[1](图四,5-8)、黑龙江中游以往被归入格罗马图哈文化的谢尔盖耶夫卡(图四,3、4)、戈尔诺耶(图四,1、2)遗址^[2],以及新彼得罗夫卡文化^[3]的附加堆纹陶器特征也有相似之处,显示出该文化交流范围的广泛。

采自黄家围子遗址 H1 一例贝壳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10290 ± 140 年(未经树轮校正,半衰期为 5568 年)^[4],可能因为较预期过于偏早而未被发掘简报采用。2011 年,东京大学大贯静夫等从早年在额拉苏 C 地点采集的陶片中选取了三例器表附着碳化物的陶片,用 AMS 方法对含炭物质做了测定。三例样品的年代分别为距今 6630 ± 35 、 6510 ± 40 、 6610 ± 40 年,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5625—前 5490 年、前 5548—前 5375 年、前 5619—前 5486 年(置信度均为 95.4%,半衰期为 5568 年)^[5]。2014 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技术室对后套木嘎第二期遗迹单位 A III G13 和 A III H93 所出各一例陶器表面的含炭附着物进行了碳十四检测,年代分别为距今 6755 ± 40 年和 6810 ± 40 年,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距今 7676—7566 年、7701—7581 年(置信度均为 95.4%,半衰期为 5568 年)。结合后套木嘎遗址 A III 区发掘简报所公布的二期 A III M32、A III M54、A III M56 三座墓葬共五例人骨的碳十四年代^[6],可将黄家围子文化的年代推定为距今 8000—7000 年。陶器特征与黄家围子文化陶器有相似之处的林西西梁遗址,F7 与 F5 居住面所采炭样经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 7060 ± 60 年和距今 6885 ± 50 年(半衰期为 5730 年)^[7]。如经树轮校正,也应在上述年代范围之内。

三 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遗存

该期遗存包括 A III F1—6、A III H70、A III G1 等开口于耕土层下的房址、灰坑、灰沟、墓葬及第 2 层即黑沙土层,也包括开口于第 2 层下的部分单位。陶器以夹蚌粉的黄褐陶或灰褐陶为主,有少量质地细腻的沙质陶。夹蚌陶所露蚌粉比例不一,蚌片粒度大小不均,形状也不甚规则,可能是选用了不同种类的蚌壳。烧成温度大体在 700—770 度。陶胎厚度与第二期陶器相

[1] 朱永刚:《论西梁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6 年第 2 期;朱永刚、王立新、塔拉:《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96—139 页,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Деревянко А. П., Громатух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7: 268—275.

[3] Деревянко А. П., Полянетровка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го Амур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0: 120—154.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87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5] 大贯静夫、国木田大、吉田邦夫:《极东北部新石器時代の变迁について——额拉苏 C 遗迹采集土器の新たな測定年代から》付编(国木田大、吉田邦夫、大贯静夫:《额拉苏 C(オロス)遗迹出土土器付着炭化物の 14C 年代測定》,第 12 回北アジア調査研究报告会,札幌学院大学人文学部白桦動研究室,2011 年。

[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 A III 区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9 期。以下所引凡出此文者不另注。

[7] 朱永刚:《论西梁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6 年第 2 期。

当,多在0.4—0.8厘米。砂质陶的火候较高,胎薄而匀称,质地较硬。器形以敞口或直口的筒形罐为主,还有少量大口鼓腹罐、小口深鼓腹罐、圆鼓腹罐、斜口器、钵和带流器(既有管状流,又有槽状流)等。陶器多于上腹或近口部施纹,习见附加堆纹条带、指甲纹、戳压列点纹(坑点有月牙形、梭形、方形、圆形、三角形等)、戳压栉齿纹(短条状或平行线),也有少量刻划细线形之字纹、刻划网格纹、刻划席纹、刻划几何纹、刻划平行线纹、压印弦纹、竖压横排之字纹、划压扭曲纹等(图五,15—26)。且往往在同一器物表面施两种纹饰。部分陶器的唇面有戳压列点纹。个别筒形罐的唇面上有半月形立耳。陶器制法仍以泥圈套接法为主。

从第三期开始,灰坑、灰沟中除鱼骨、蚌壳外,还出现大量哺乳动物骨骼。以AⅢG1为例,在长10.5、宽0.85—1.25、深0.4—0.58米的沟内,动物骨骼由沟底到沟口呈连续状堆积,但散乱无序,伴出烧土、炭粒及少量石器、陶片等。可鉴定的动物骨骼包括鱼类四千七百二十六件、软体动物类三百五十八件、爬行类十件、鸟类六件、哺乳类一千四百一十八件。在哺乳类动物骨骼中,野牛骨骼占可鉴定标本的81%〔1〕。石器仍以细石器为主。有少量磨盘与磨棒,但仍然不见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石铲、石锄、石刀等。这一切表明渔猎仍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业方式。

以往在吉林镇赉坦途北岗子、东哈吐气北岗、脑代窝堡北岗、向阳南岗、河宝吐东南岗〔2〕、西昆都冷〔3〕、黑龙江泰来绰尔等、东翁根山〔4〕等遗址的调查中都曾发现过此类遗存的纹饰陶片。镇赉向阳南岗遗址〔5〕、乌兰吐北岗〔6〕、昂昂溪滕家岗子〔7〕、胜利三队一号〔8〕等遗址还曾发掘过此类遗存。但以往多将此类遗存笼统地归入“昂昂溪文化”之中。现在看,此类遗存特征不仅有别于以往嫩江中下游地区可确认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而且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可以出土遗存最丰富的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暂名之为“后套木嘎三期文化”。

〔1〕 宋姝、陈全家、王立新:《大安后套木嘎遗址 DHAIIG1 动物骨骼遗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

〔2〕 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镇赉县文物志》,15—19、31、32、44—46、71、72页,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1984年。

〔3〕 2009年王立新等复查过该遗址。在采集遗物中复原一件夹蚌砂质灰褐陶大口鼓腹罐,上腹及颈饰指甲纹组成的几何纹带,与后套木嘎第三期同类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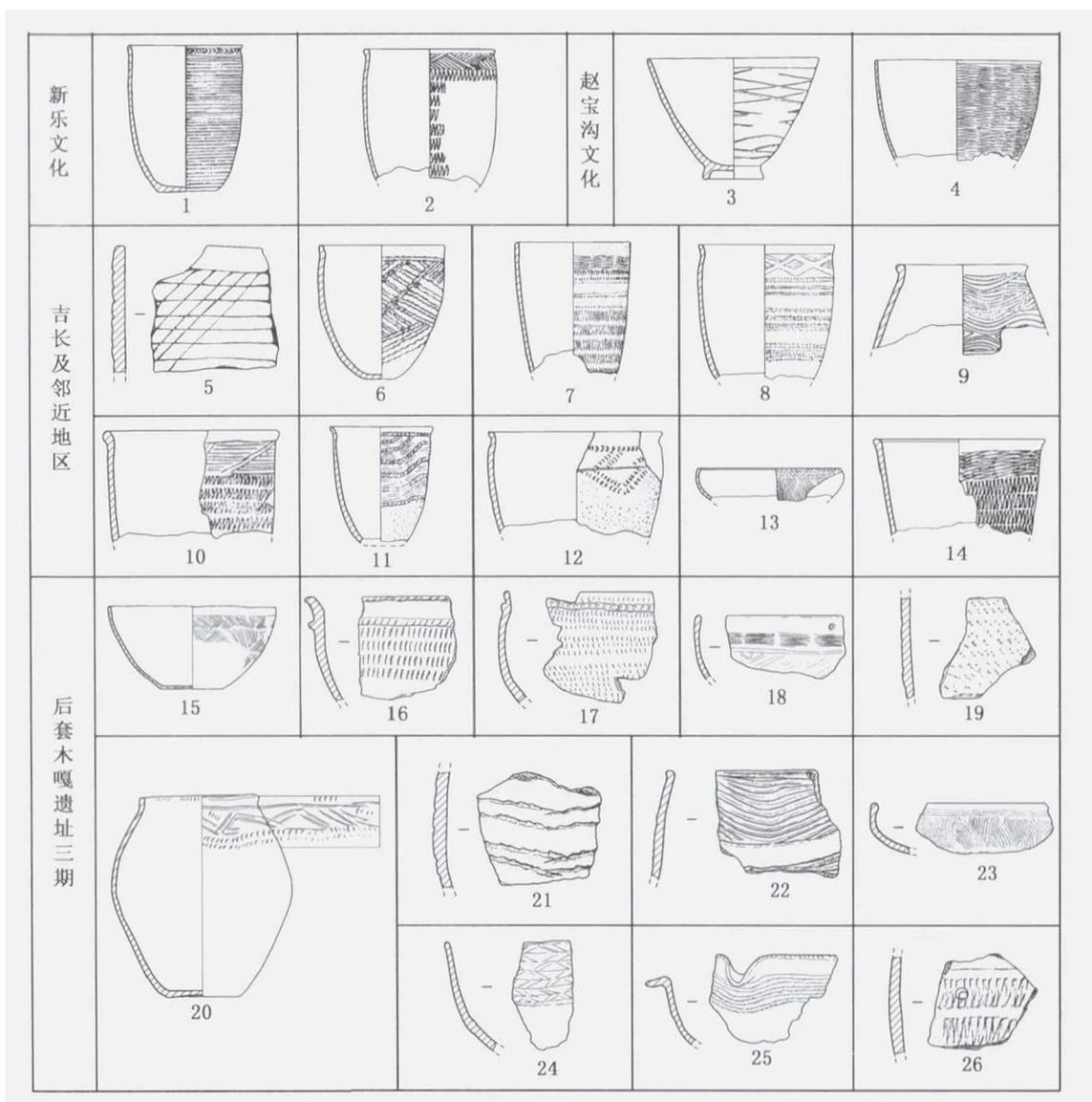
〔4〕 王广文、王永祥:《黑龙江省泰来县嫩江沿岸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报告》,《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泰来县文体局、泰来县博物馆:《泰来文物古迹》,20—23页,泰来县博物馆,2008年;鞠桂玲:《浅谈东翁根山石器时代遗址》,《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年第26期。

〔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向阳南岗遗址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待刊)。

〔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镇赉县文物管理所:《吉林省镇赉县乌兰吐北岗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7〕 马利民、项守先、傅维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滕家岗遗址三座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清理》,《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其中83ATM1出土人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6981±69年,接近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的年代。但是据简报交待“墓葬均位于黑色沙土层上部”,由嫩江中下游地区地层堆积的一般特点可以推知,墓葬系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第2层即黑沙土层,且该墓随葬的小玉环内壁较薄,同类形制的玉环也见于后套木嘎第三期的墓葬之中,故该墓的年代很可能与后套木嘎第三期相当。201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滕家岗遗址的发掘中发现过与后套木嘎第三期相似的陶器,资料现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8〕 李龙:《昂昂溪胜利三队一号遗址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1期。



图五 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遗存与相关遗存陶器

1. 83 ○六 F2 : 14 2. 83CDF4 : 5 3. F9① : 58 4. F105② : 10 5. CT2②标 : 2 6. H5 : 32 7. F3 : 6 8. H5 : 28
 9. T16④ : 4 10. T16④ : 6 11. T16④ : 1 12. T16④ : 12 13. H11 : 3 14. H2 : 3 15. G1 : 43 16. A ■ H179 :
 1 17. A ■ H61① : 15 18. A ■ H61① : 17 19. A ■ G9 : 4 20. A ■ G1 : 35 21. A ■ T1102② : 10 22. A N T0707
 ② : 2 23. A N H44 : 17 24. A ■ G15 : 4 25. A ■ H128 : 4 26. A ■ F8① : 23

与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即黄家围子文化相比,该文化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种类都更为复杂,小口深鼓腹罐、圆鼓腹罐、斜口器和带流器等不见于前者,指甲纹、戳压栉齿纹、压印弦纹、压印之字纹、划压扭曲纹及刻划类纹饰也基本不见于前者。不过,附加堆纹的存在,则显示出该文化陶器在装饰风格上与前者仍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戳压列点纹中的多数坑点形状,也都与黄家围子文化陶器唇面或附加堆纹上的戳印纹基本相类。不同的是,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陶器多数仅

于近口部饰一至三周附加堆纹条带，而不如前者繁缛，且戳压列点纹既施于附加堆纹条带和唇面之上，也在器物上腹单独施用。但两种文化在陶器面貌上的明显变化，似乎表明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年代缺环，并非属直接继承的关系。

后套木嘎三期文化陶器装饰中所见少量的划压扭曲纹(或称阶梯纹)、竖压横排之字纹、刻划细线形之字纹、刻划席纹、刻划几何纹等，风格与吉长地区农安元宝沟〔1〕、左家山(一期和二期)〔2〕、长岭腰井子〔3〕、东丰西断梁山(一期)〔4〕等遗址出土陶器的纹饰非常相似，且属吉长地区的常见纹饰种类(图五，5—14)。吉长地区的此类遗存以往多被分作左家山一期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两类，近来赵宾福、于怀石的分析表明，二者实属同一考古学文化，并称之为左家山下层文化〔5〕。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后套木嘎三期文化中所见的上述纹饰种类，应当就是受南邻的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同时，该文化所见竖压横排之字纹、压印弦纹与刻划细线形之字纹、刻划几何纹也分别是下辽河流域新乐下层文化和辽西山地赵宝沟文化的代表性陶器纹饰(图五，1—4)。这表明，嫩江中下游地区的此期文化至少在陶器的纹饰风格方面，与以南、以西地区的同期文化呈现出了更大程度的一致性。不过，新乐下层文化与赵宝沟文化所见的上述纹饰多密集而规整，且几乎遍布器身，而后套木嘎三期文化所见同类纹饰不仅略显潦草，且只施于器身上部或近口处。除地域原因之外，或许彼此年代略有早晚。

值得注意的是，后套木嘎三期文化与嫩江流域以东、以北地区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流关系。该文化中所见戳压月牙形列点纹，与黑龙江下游的马雷舍沃文化〔6〕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新开流上层〔7〕习见的鱼鳞纹十分相似(图六，1—10)。所见戳压短条状栉齿纹则与松花江流域的尚志亚布力遗址〔8〕出土陶器中常见的篦点纹(图六，11、12)风格十分接近。此类纹饰也流行于俄罗斯远东东南端博伊斯曼文化〔9〕的陶器群中(图六，13—15)。据冯恩学研究，亚布力遗存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可称为亚布力文化。该文化与俄罗斯境内的博伊斯曼文化属于联系密切的“亲族文化”，年代大致在距今6500—5000年〔10〕。考虑到地域相对邻近，后套木嘎三期文化所见此类纹饰很可能是受亚布力文化的影响产生的。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县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第12期。

〔2〕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地区博物馆、长岭县文化局：《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年第8期。

〔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东丰县西断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91年第4期。

〔5〕 赵宾福、于怀石：《左家山下层文化新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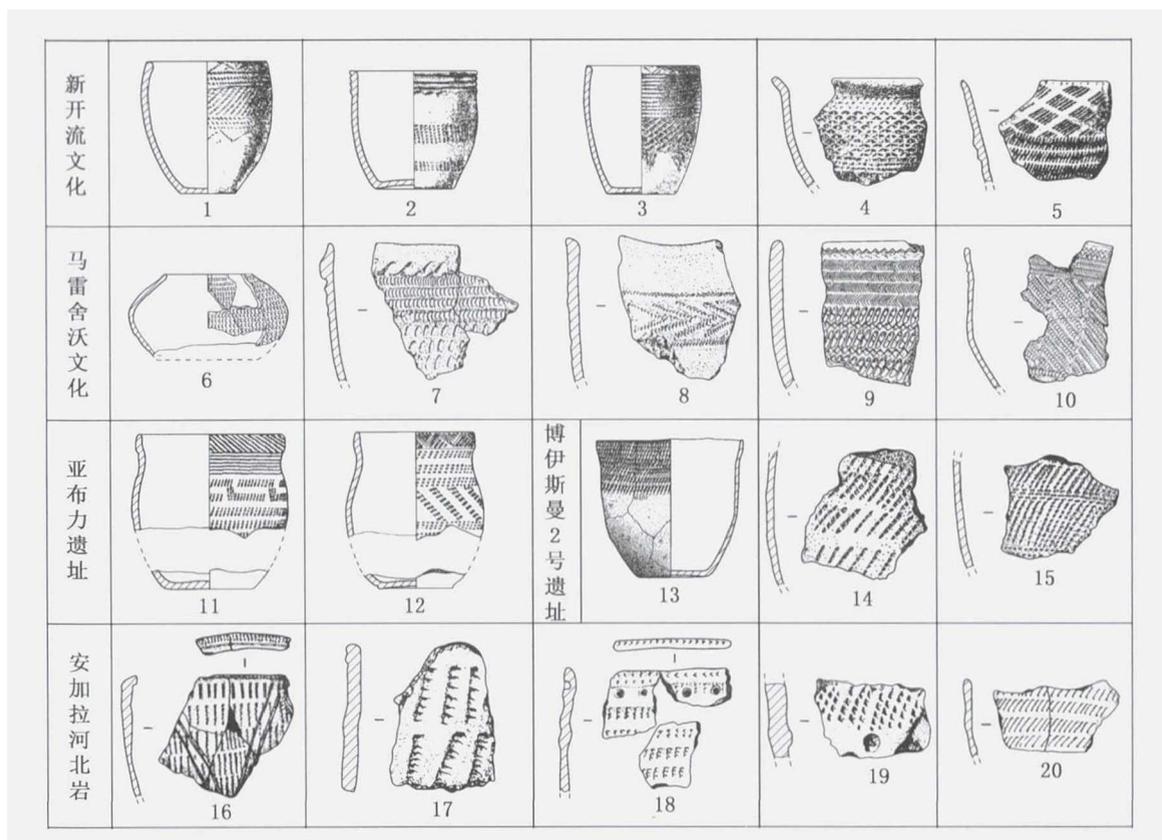
〔6〕 A·П·杰列维扬科、B·E·麦德维杰夫：《加夏遗址研究——1980年初步结果》，宋玉彬译述，林运校，《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1—15页，北方文物杂志社，1996年。

〔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尚志县亚布力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

〔9〕 Попов А. П., Чикишева Т. А., Шпакова Е. Г., Бойсман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Приамур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7: 14—32.

〔10〕 冯恩学：《俄罗斯远东博伊斯曼文化与倭肯哈达、亚布力遗址的联系》，《北方文物》2003年第2期。



图六 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遗存与相关遗存陶器

1. T5②: 12 2. M7: 21 3. M3: 1 4. T6②: 201 5. T4②: 202 6-10. 加夏遗址出土 11. YBF1: 13
12. YBF1: 12 13-15. 博伊斯曼 2 号遗址出土 16, 18, 20. 乌斯季-科维遗址出土 17. 巴尔特遗址第 2 层出土
19. 鄂杜千卡遗址出土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此类纹饰不仅见于远东南部的牡丹江流域与大彼得湾邻近地区,甚至在东西伯利亚安加拉河下游北岸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图六,16-20)中也属于一种颇为典型的纹饰种类^[1]。足见同类纹饰流行区域之广,当然也显示出该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联系较之第二期更为广泛。

属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镇赉向阳南岗ⅡF1所采贝壳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5020 ± 85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961—前3704年(半衰期为5568年)^[2]。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技术室对后套木嘎第三期单位A1VH44和AⅢT1307②所出各一例陶器表面的含炭附着物进行了碳十四检测,年代分别为距今 5210 ± 35 年、 4920 ± 35 年,经树轮校正后分别为距今

[1] 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Р. С., Бурилов В. В., Дроздов Н. 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северного приамур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8: 154, 160—166, 172—174, 190, 19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 87页, 文物出版社, 1992年。检测样品地点记为太平南岗, 遗迹编号为ⅡF1。

6172—5906年、5719—5593年(置信度均为95.4%，半衰期为5568年)。发掘简报所公布的后套木嘎第三期AⅢM50、AⅢG1、AⅢG6、AⅢF1、AⅢF6五个单位十一例标本(一例人骨，十例木炭)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6000—5400年间。地域邻近的左家山遗址的一期后段T11第3层出土蚌壳，碳十四年代为距今6755±115年(经树轮校正，半衰期为5730年)。元宝沟遗址H5出土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6140±175年(经树轮校正，半衰期为5568年)。依据碳十四测定及与邻近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年代的比较，可初步推定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年代约在距今6800—5500年。该文化的确认，填补了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又一个重要缺环。

四 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存

此期遗存在AⅠ、AⅢ和AⅣ发掘区都有分布，以ANG2、ANG3、ANH33、AⅢM41、AⅢM80等单位为代表。发现有灰坑、房址、灰沟、墓葬、灶等遗迹，皆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第2层。陶器既有夹蚌陶，又有不加掺和料的泥质陶，夹蚌陶所属蚌粉比例较第三期陶器明显减少。器表颜色以红褐色和黄褐色为多，少量灰褐色和红色。陶器的胎较薄而均匀。烧成温度已接近850度。泥圈套接法成形。器表多素面，并经磨光，有些陶器器表隐约可辨细密的纵向刮抹痕迹，少量饰麻点纹(或称滚压窝纹)、压印弧线之字纹及刻划人字纹。器形见有筒形罐、小口深腹鼓肩罐、小口鼓肩双耳罐、带流器、钵等(图七，10—14)。

此期细石器仍较常见。磨盘与磨棒数量增多。新出现穿孔石刀。结合植物遗存鉴定结果看，这一阶段农业很可能已在居民经济生活中占据一定比重。但灰坑与灰沟中仍常见连续堆积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骼或鱼骨，表明渔猎仍是居民主要的生计来源。

该期遗存与近年发掘的白城双塔二期^{〔1〕}、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2〕}、科右中旗哈尔沁^{〔3〕}、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D地点^{〔4〕}、道老杜粮库^{〔5〕}等遗址出土遗存均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而与后两处遗存的特点最为接近。上述诸遗址出土遗存显然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这类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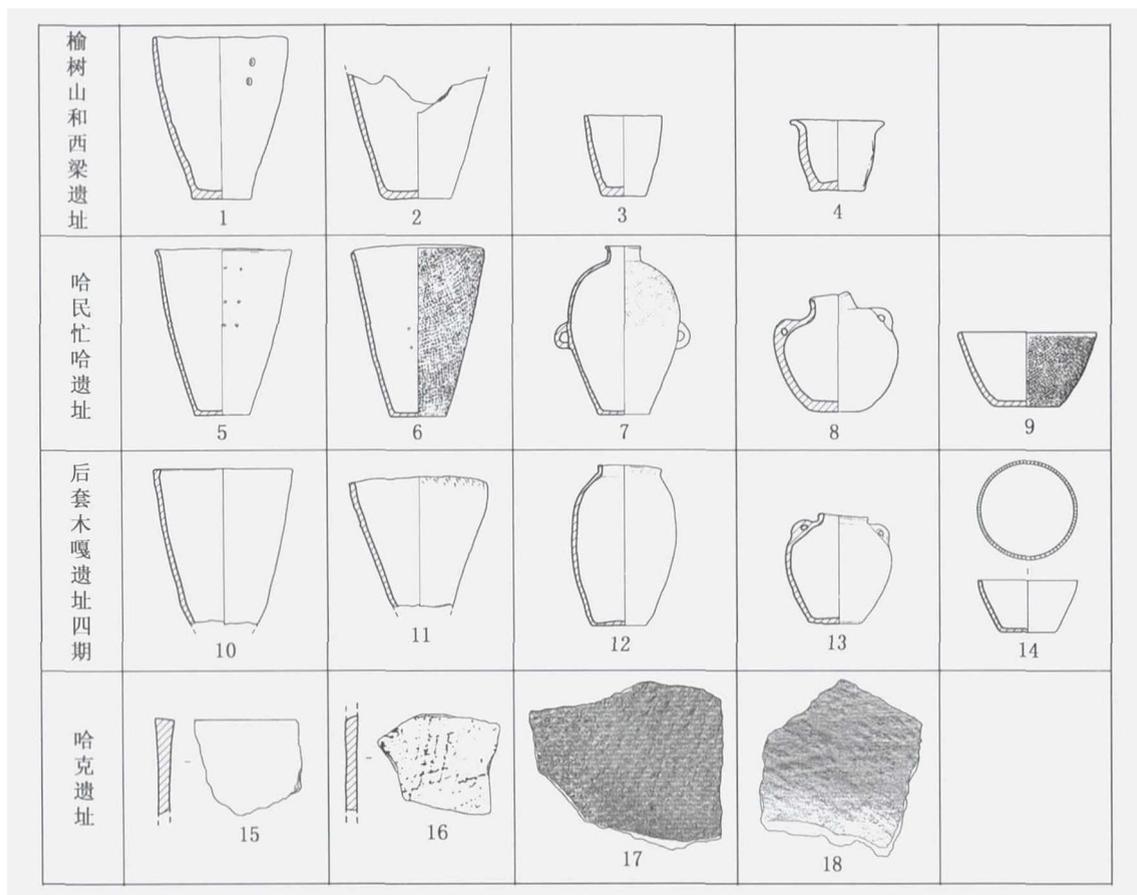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0期。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哈尔沁新石器时代遗址》，《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4〕 塔拉、吉平：《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墓地及遗址又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9日第5版。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粮库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图七 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存与相关遗存陶器

1. F8②: 6 2. F14②: 6 3. F110①: 18 4. 88MAJ1 调查 5610 5. F2: 14 6. F7: 12 7. F8: 4 8. F13: 5 9. I T008066②: 1 10. ANG2: 93 11. ANH33: 4 12. A ■ M41: 1 13. A ■ M80①: 1 14. ANH54: 3 15. 04T3⑥: 720 16. 08T5-T6B⑥-②: 19 17. 08T5-T6B⑥-①: 18 18. 04T6⑥: 662

存是 2007 年我们通过对科尔沁沙地调查及双塔遗址的发掘辨识确认的^[1]，鉴于随后发掘的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存更为丰富，我们同意将其命名为哈民忙哈文化^[2]。值得注意的是，哈民忙哈遗址出土此类遗存虽然也有较多素面陶，但麻点纹、之字纹所占比例较高(图七，5-9)，而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 D 地点、道老杜粮库遗址出土陶器则基本为素面陶。郑钧夫、朱永刚等推测含麻点纹比例较高的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存年代上应略早于后两者出土陶器^[3]，是有道理的。后套木嘎第四期遗存的年代特征似乎处于哈民忙哈与后二者之间。早年发掘的敖汉旗

[1] 王立新:《双塔遗址》,《田野考古集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3] 郑钧夫、朱永刚、吉平:《试论哈民忙哈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榆树山和西梁遗址,出土遗存被笼统归为“兴隆洼文化小河西类型晚段”〔1〕。但从报道的有限材料看,其中的纹饰陶片分属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而榆树山 F8 和 F14、西梁遗址 F110 出土的素面筒形罐(图七,1—3),陶胎较薄,火候较高,形体瘦高,特征有别于可明确判断为小河西文化的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一期陶器〔2〕,而形制特征与哈民忙哈遗址及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同类器非常相似,尤其是榆树山 F14②:6 器表有纵向刮抹痕,风格更似哈民忙哈文化的素面筒形罐。所以,这三个单位及采集的一件素面小罐(图七,4),文化性质很可能归属于哈民忙哈文化。

此类遗存陶器群中所见小口深腹鼓肩罐多系泥质红陶,虽然有些腹饰麻点纹,但陶质、陶色与器形特点均与红山文化同类器相同。哈民忙哈遗址的发掘及科左中旗、通榆县诸多遗址的调查中都曾见到红底黑彩的陶片和弧线之字纹陶器,数量相对来说都不多,这些纹样及相关器形很可能是受红山文化影响而产生的〔3〕。也正如发掘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该类遗存的玉器种类与形制也与红山文化玉器有密切联系。但是,这类遗存最典型的形体瘦高、腹壁斜直的筒形罐,以及陶器流行素面磨光、麻点纹及斜方格纹装饰的风格,与红山文化的陶器特征有很大区别。玉器除少量斧、镞类工具之外,多系形体扁平的小型璧、环类坠饰,而少见动物形或动物纹玉器。墓葬皆土坑竖穴墓,葬式既有仰身叠肢葬,也有仰身直肢葬和侧身屈肢葬。房址多见门道狭长的圆角方形或长方形。这些特征也都与红山文化的墓葬和房址判然有别。显然,这是一支与红山文化地域毗邻,而又受其影响较大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曾推断两类遗存分布区的交界大致在库仑至天山一线〔4〕。敖汉旗榆树山与西梁遗址素面陶器在辽西区的出现,似表明该文化在偏晚阶段也曾将其势力伸延到红山文化分布区之中。此外,哈民忙哈文化中习见的素面深腹筒形罐在左家山三期中可以看到,而左家山三期陶器上常见的刻划人字纹,在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遗存中也有少量发现。表明两种文化应存在一定的交流。

通过陶器特征的比较,已有学者指出哈民忙哈文化应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大体相当〔5〕。

取自后套木嘎遗址第四期单位 A III H85 的一个口沿残片,内外壁皆有含炭残留物,经东京大学测试,年代分别为距今 4420±35 年(外侧)和 4420±45 年(内侧),经树轮校正分别为距今 5273—4868 年、5280—4866 年(置信度均为 95.4%,半衰期为 5568 年)。综合考虑,可将该文化的年代范围推断为距今 5500—4900 年。左家山遗址第三期 H17 所出炭化骨骼的碳十四测

〔1〕 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出土遗物综述》,《北方文物》2009 年第 2 期。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21—24 页,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 11 辑,科学出版社,2012 年。

〔4〕 王立新、宋德辉、夏宏宇:《吉林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的复查与初步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 8 辑,科学出版社,2009 年。

〔5〕 郑钧夫、朱永刚、吉平:《试论哈民忙哈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 15 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

定年代为距今 4870 ± 180 年(经树轮校正,半衰期为 5730 年)^[1],可作参考。

该类遗存目前仅带流器、钵等极少量成分尚可看出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之间的联系,而陶器群的主体特征则明显有别,显示出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就目前发表的材料,若想探明该类遗存的来源是比较困难的,但也有一定线索。呼伦贝尔哈克遗址 T3—T6 第 6 层虽出有铁鱼钩和青铜刀,碳十四测年也在汉代前后,但发表的陶片皆属于新石器时代遗物^[2]。其中 T3⑥:461 系绳纹陶片,纹饰风格同于该地点第 7 层出土陶片。而第 6 层出土的 A 类(带沟槽的平行栉齿纹)、C 类(戳印列点纹)、D 类(附加堆纹)纹饰,都可在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中找到类似的纹样,表明该遗址很可能曾存在过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同期的文化堆积。恰是此层中数量较多的 B 类纹饰即所谓拍印“棱格纹”,有的呈斜向交叉的网格状(图七,16、17),像是由缠绳棒状物交叉滚印而成,风格与哈民忙哈文化流行的麻点纹特点一致。有的则的确在器表留有斜向菱格(图七,18),颇类哈民忙哈文化中较为常见的拍印斜方格纹(图七,7)。尤其是前一类纹饰,与广大西伯利亚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流行的“网纹”(似交叉绳纹,但有绳结点印痕),以及黑龙江中游格罗马图哈文化中流行的“纺织纹”或“仿纺织纹”(交叉细绳纹)^[3]都有相似之处。目前的发现表明,与西伯利亚地区类似,我国的呼伦贝尔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也是绳纹类纹饰比较流行的区域。辉河水坝遗址 M1 出有一件“陶碗”(颇似一件陶罐的底部),腹与底饰有网格状的绳纹,而此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 8555 ± 40 年(半衰期 5568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 7600 年)^[4],表明此类纹饰的使用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即有悠久的传统。不仅如此,在哈克遗址,最早的第 7 层(两例碳十四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 7710 ± 40 年和距今 7355 ± 35 年)以及包含晚期遗物的第 6 层中都出有较多方唇、斜直壁、素面的筒形罐残片(图七,15)^[5],说明素面筒形罐也是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曾经流行的典型器类,其形制特征也与哈民忙哈文化的素面筒形罐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后套木嘎第四期遗存,即哈民忙哈文化,其主体文化成分很可能是自呼伦贝尔草原辗转南下而来的。

五 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

分析表明,后套木嘎遗址的四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应分别代表了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

[1]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 年第 2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博物馆:《哈克遗址:2003—2008 年考古发掘报告》,110—113、209—211 页,图版二〇,文物出版社,2010 年。

[3]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102—189、223—235 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 年第 1 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博物馆:《哈克遗址——2003—2008 年考古发掘报告》,74—85、110、111 页,文物出版社,2010 年。

代文化的四个发展阶段。通过与相关遗存的比较,又可知长坨子 A 类遗存可能是继承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即黄家围子文化,又是由双塔一期文化发展而来,那么长坨子 A 类遗存与双塔一期文化孰早孰晚,则成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研究的关键。可惜的是,迄今尚未发现长坨子 A 类遗存的原生堆积及其与双塔一期文化之间的层位关系。

前文述及,后套木嘎遗址第一期遗存层位偏晚的 A III G18 中,有少数夹炭陶的胎内已开始麇入蚌粉,个别陶片的胎内开始麇入砂粒,而至长坨子 A 类遗存,陶器胎内所含植物纤维成分明显减少,并普遍麇入蚌粉,少量麇入砂粒,总体存在一个搀和料逐渐优化,陶器硬度逐渐加强的过程。双塔一期文化陶器的制作技术虽然仍十分原始,火候偏低且泥圈套接处明显起棱,但胎内已不含植物纤维,而多含蚌粉。显然,从制陶技术的演进角度看,长坨子 A 类遗存很可能是处于由后套木嘎一期向双塔一期文化发展的中间过渡阶段。所以,可尝试性地将上文所论诸类遗存或文化编排为由早至晚的发展序列: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长坨子 A 类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围子文化(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哈民忙哈文化(后套木嘎第四期遗存)。长坨子 A 类遗存的文化面貌、年代、性质及其与双塔一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工作来解决。

除上述六种文化或遗存之外,赵宾福则提出嫩江流域可辨识出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靶山类型和昂昂溪文化三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代表三个由早至晚的发展阶段^{〔1〕}。其中的靶山类型包括 1984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白城西郊靶山墓地所清理的五座墓葬^{〔2〕}和 1962 年张忠培在大赉傲包山遗址调查时所清理的三座墓葬^{〔3〕}。后一地点即现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由于遗址地表经过多年的农田改造、植树和兴修水渠的破坏,我们未能确认当年所清理三座墓葬的具体位置。从报道中仅知这三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单人一次葬,仰身直肢,头向西,随葬品仅见琢制石镞和兽牙项饰(未附图)。由这些信息是难以确切判定此三座墓葬的文化性质归属的。靶山墓地清理的五座墓葬,虽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但是也不见随葬陶器。赵文据墓葬出土无孔骨鱼镖和窄瘦三角形石镞及两座墓葬出土人骨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判定这几座墓葬的年代“明显早于昂昂溪文化”,“年代范畴应该在距今 5500—5000 年左右”。由于两座墓葬的碳十四年代在哈民忙哈文化的范围之内^{〔4〕},可以暂将靶山墓地所清理的这五座墓葬归属于该文化阶段。赵文所界定的“昂昂溪文化”,包括了昂昂溪五福三号地点的两座墓、二克浅

〔1〕 赵宾福:《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 2 辑,科学出版社,2003 年。

〔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12 期。

〔3〕 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

〔4〕 其中靶山 M1 人骨的年代为距今 4730±80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3634—前 3374 年;M4 人骨的年代为 4500±95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3358—前 3035 年(半衰期均为 5568 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87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M6^{〔1〕}、昂昂溪胜利三队一号遗址 H1、H2、黄家围子 H1、H2、H3、第3层和小拉哈一期乙组^{〔2〕}。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赵文认为二克浅 M6 与昂昂溪五福三号地点两座墓葬的年代基本同时,代表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最晚发展阶段,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将昂昂溪胜利三队一号遗址的两个灰坑、黄家围子遗址早期遗存和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也归入昂昂溪文化,则并不合适。以上三地点遗存的性质归属已如前述。

小拉哈遗址一期甲组遗存虽然亦无原生遗迹单位,但发掘报告认为该类遗存典型的凹弦纹和刻划席纹分别与新乐下层文化和左家山一期文化的同类纹饰特征一致,年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前引赵文也持相同观点。南宝力皋吐墓地发掘之后,发掘者已注意到该类遗存中既包含辽西区小河沿文化因素,又包含下辽河流域偏堡子类型因素,还有与“小拉哈一期遗存”相似的因素。但文中并未刻意区分小拉哈一期甲组与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3〕}。随后郑钧夫在其博士论文中称,小拉哈一期甲组和一期乙组两种遗存在南宝力皋吐墓地中实际上是共存的。并将小拉哈一期甲组的刻划弦纹与席纹筒形罐、小拉哈一期乙组的横向附加堆纹筒形罐口沿、昂昂溪五福三号地点墓葬出土的刻划复线几何纹鼓腹罐与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同类器进行了比较,继而认为小拉哈一期甲组、一期乙组、昂昂溪五福三号地点墓葬与南宝力皋吐墓地都是同时期的遗存^{〔4〕}。我认为郑钧夫博士将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昂昂溪五福三号地点墓葬与南宝力皋吐墓地视为同期遗存是有道理的。从实物观察来看,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陶器凹弦纹与刻划席纹的组合纹饰,以及砂质黄褐陶、器壁较薄、唇不加厚、器腹微弧、平底较大等特点,确与南宝力皋吐墓地的部分筒形罐(如 AM99:1、NM162:2)形制最为接近,可以将其与南宝力皋吐墓地视为同一阶段的遗存。但是,郑文将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也与南宝力皋吐墓地视为同期遗存则是错误的。前文我们已将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的条状附加堆纹陶器归入了黄家围子文化。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陶器虽与南宝力皋吐墓地随葬陶器都有条形堆纹装饰,但前者的堆纹多横向平行,且多捏压成锐棱,后者则多见不经捏压的绳索状或细辫状附加堆纹,且多横向与竖向堆纹组合使用。器形上,前者的罐类器口部有侈口弧腹、敞口斜腹、直口或口微敛的筒腹等几种,多见厚唇,而后者的附加堆纹陶器则多见直口或敛口、唇不加厚、腹壁略弧的筒形罐,且多于腹中部加双耳。前者不见南宝力皋吐墓地典型的敛口叠唇罐及细砂质且装饰刻划几何纹的壶、圆腹罐、尊形器等,可见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总之,以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遗存为媒介,可知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与昂昂溪五福三号地点的墓葬属于同期遗存,且二者在地域上邻近,所以可将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归入赵善桐、杨虎等最初所限定的昂昂溪文化的范

〔1〕 安路、贾伟明:《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21—41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4〕 郑钧夫:《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研究》,88、89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畴。

朱永刚与吉平在分析了南宝力皋吐基地的文化因素之后,认为以该基地为代表的遗存既不能归入小河沿文化,也不能归入偏堡子类型,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1]。这显然是基于该基地陶器群中含有一组腹饰绳状或辫状附加堆纹条带的筒形罐、腹饰内填平行线的几何纹鼓腹罐、素面抹光深腹筒形罐等自身特色的因素所得出的认识。然而,在所谓自身因素中,前两种器类实际上可视为昂昂溪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类,只不过有待进一步发掘补证。而素面抹光的深腹筒形罐及带流器等,则应属于承继哈民忙哈文化发展而来的因素。所以就目前来看,重新界定后的昂昂溪文化无疑可以排在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最后阶段。南宝力皋吐基地地处松辽分水岭,属于传统所说的辽西文化区和嫩江中下游文化区(或称松嫩文化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南距下辽河文化区也较近,文化成分上呈现出三种文化因素交汇共融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此类地域性的过渡类遗存,可依张忠培主张^[2],直接称之为南宝力皋吐遗存。

以上对后套木嘎遗址四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特征、性质、年代、来源及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周边相关的考古发现,尝试性地将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排定为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长坨子 A 类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围子文化—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哈民忙哈文化—昂昂溪文化。能够取得这样的初步认识,得益于我们自 2007 年以来先后数次对内蒙古通辽、兴安盟地区和吉林白城地区多个市县范围的考古调查,以及在调查基础上选择白城双塔、大安后套木嘎遗址所进行的发掘。这些工作,将会成为推动相关研究步入纵深的基础。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编号:15ZDB055)研究成果。东京大学大贯静夫教授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娜塔莉亚·策德诺娃女士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相关资料,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潘玲教授提供了俄文翻译的帮助,汤卓炜教授与法国植物考古专家玛格丽特·滕贝理女士对后套木嘎第一期陶器胎内所含炭化植物纤维的种类进行了鉴定,特此致谢!

[1] 朱永刚、吉平:《关于南宝力皋吐基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考古》2011年第11期。

[2]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STUDIES ON THE REMAINS OF THE NEOLITHIC AGE IN HOUTAOMUGA SITE AND RELEVANT ISSUES

by

Wang Lixin

The Houtaomuga (Hou Tomog) Site in Da'an City, Jili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site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lower reach of the Nenjiang River containing the remains of th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and so on. The five-year continuing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o this site in 2011—2015 obtained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four kinds of cultures of the Neolithic Age found in this site made up some missing links in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Nenjiang River, and enriched the understandings to the connotations and 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this region. Of these remains, the Phases I and III are two new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den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Nenjiang River, especially the remains of Phase I, which is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 found to date in Northeast China, the date of which is 13—11 ka BP. The discovery of the remains of Phase II confirmed that the previously suggested “Huangjia Weizi Type” is also an independ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which should be isolated from the generally called “Ang'angxi Culture” in the past. The discovery of the remains of Phase IV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Hamin Mangha Culture in some sense.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nearby the Houtaomuga Site, this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Nenjiang River as the following: Houtaomuga Phase I Culture — Changtuozi Type A — Shuangta Phase I Culture — Huangjia Weizi Culture — Houtaomuga Phase III Culture — Hamin Mangha Culture — Ang'angxi Culture, which laid chro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is region.

责任编辑：左豪瑞